

“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概念之辨

——兼论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戴佳 史安斌

摘 要: 在全球化时代,传播的主体、价值观与手段日渐多元化,因此以国家为主体,由政治所规定的国际传播,正逐步被由个人、群体、组织、民众、政府跨越国界传递信息、价值观和态度的全球传播所取代。相应地,国际新闻报道人才培养,应该面向全球治理的目标,培养全球传播人才,以顺应网络社会新闻传播的时代趋势。而实现这一目标目前面临的挑战,除了克服专业领域内的视野局限与信息偏颇,更为迫切的是在政治话语体系与公共生活中保障新闻自由与民意畅通,促使国内舆论环境与国际舆论环境的接轨。

关键词: 国际新闻传播; 全球新闻传播; 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形象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14)

作者简介: 戴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北京 100084);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国家形象工程”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的提出,使“国际新闻传播”及“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成为学界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什么是国际新闻传播?如何培养合格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已发表的研究或涉及战略解析,^①从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强调国际传播的重要性;或介绍重要国际媒体机构的经验,以期获得借鉴与参考;^②或探讨不同培养模式的短长,力图思考现有教育模式有效的改进方法。^③

这种从维护与推广国家形象出发,带着强烈的“外宣”色彩,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学术讨论成为一时之显有一定的必然性。从历史传统来说,世界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信息流动不平衡现象一直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时常出现冲突与摩擦;而从现实来说,2008年国际媒体对于西藏拉萨事件报道出现的一些歪曲报道,又再度掀起了有关“妖魔化”中国的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宣扬国家形象及制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目的对外传播,显示了面临挑战之后的“应对”姿态。^④

然而,基于政治服务意识的学术探讨,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及效果上的局限。在全球化时代,以国家为主体,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正逐步被全球传播所取代。从理论认知层面来说,随着传播的主体、价值观与手段日渐多元化,由“举国动员”与“政府助推”模式主导的国际传播,显然有悖时

① 参见王庚年《世界格局变化中的文化国际传播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480463.html>; 胡正荣《转变内外传播观念 适应国际传播战略的新变》,国际在线 http://www.qstheory.cn/dd/2011/gjcbnl/201103/t20110308_71273.htm; 汪飞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策略》,传媒学术网,2011年 http://www.qstheory.cn/special/2011dd/gjcbnl01/xxqgh/201110/t20111009_115003.htm。

② 参见常江《发达国家电视国际传播策略与经验——以BBC、RT、NHK为例》,《中国记者》2011年第10期。

③ 参见胡芳、高晓虹《论新时期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李习文、周庆安《底蕴涵养与路径整合——国际新闻传播硕士培养三种模式评析》,《中国记者》2012年第2期。

④ 参见胡晓明《国家形象:探究中国国家形象构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代潮流。与此相应,学术探讨围绕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这样的政治命题来展开,难免对学术的独立与客观特性构成挑战。从效果角度来看,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中国国家形象片等“走出去”的策略未见引起期待中的国际赞誉,而一些突发的信息控制例如2012年3月新浪腾讯等微博关闭评论的措施,却遭来路透社与《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一致质疑。得失利害之间,去除政治考虑,回归国际新闻传播的本质问题于是显得非常重要:国际新闻如何操作才是时代之选?国际新闻人才培养,是培养全球新闻人才还是对外宣传人才?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进行概念辨析。

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概念辨析

尽管学术界对于国际新闻(international journalism)与全球新闻(global journalism)的概念界定一直以来存在异议,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各种辨析,但概念的起源决定了二者之间本质的差异。作为国际新闻“属概念”的“国际传播”,在1922年由Rogers提出时,恰逢传播技术在国际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用突显而获得国家重视,因此它强调跨越国家和主权边界的传播行为如何服务于国家利益。^①即使跨国公司与组织也被认为是传播主体的一部分,关注焦点仍在于如何通过传播宣传与扩大国家影响,对于美国学术界而言尤其如此。而全球传播的概念在1993年由另一位美国学者Frederic提出时,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已被多元的传播主体利用来实现多元的传播目的,因此他将全球传播界定为个人、群体、组织、民众、政府以及信息技术机构跨越国界传递价值观、态度、意见、信息和数据的过程。^②相应地,作为二者“种概念”的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也存在显著区别。

首先,国际新闻的主体是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新闻媒介;而全球新闻的主体除了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新闻媒介之外,还包括以其他形式的利益诉求(例如,民间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媒介或个体新闻记者。

其次,就传播目的而言,国际新闻的根本目标是塑造民族国家的国际形象,维护国家利益。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国际新闻强调文化的冲突及控制,以及新闻对于政治尤其是对外政治演变的影响。^③全球新闻的目的则是全球范围内信息的自由沟通与交流,虽然难免也会体现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传播的目的并不是强化这种差异,推广特定的价值观。

再次,国际新闻是为国家树立形象、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生,因此其过程往往渗透着社会动员。也就是说,国家政权通过权力使传播合法化,赋予其积极意义,并保障传播的实施。^④而全球新闻则相反,它通常是媒介或记者个人基于全球受众信息交流需要的职业或自发行为,既不需要举国动员,也不依赖行政手段推进。

另外,就内容而言,国际新闻是对本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关于国际事务的政策、立场、观点、主张等的传播;而全球新闻虽然同样可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力图超越国家立场而关注全球问题。例如有学者指出,全球新闻营造了一个全球公共领域,它向国家政治施压,并提供国家内部无法提供的传播能力。例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报道美国“9·11”事件以及反恐战争

① 参见 Rogers, W. S., *Interactional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 *Foreign Affairs*, 1922, 1 (2), pp. 144-158.

② 参见 Frederic, Howard H., 1993,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③ 参见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杰里尔·A. 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④ 关于党和政府对国家形象塑造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参见胡晓明《国家形象:探究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的新闻时,对阿富汗观点和美国观点采用了相近篇幅的报道,在阿拉伯及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①

最后,传播的对象迥异。国际新闻由于具有明显的国家色彩,其受众或定位于境外人群(如“外宣”的目标人群),或定位于境内人群(如国际事件之中国解读);而全球新闻由于相对去意识形态化,受众没有特定指向,可以是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人,境外与境内人群可以共享新闻的意义。

依据上述几个维度区分“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可看到,决定二者差异的根本在于,是否存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参照系。如果存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参照系,民族国家将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与推动者,传播的过程与内容都针对特定对象,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国际新闻)。反之,传播就是由多元主体参与、较少涉及民族国家政治议程的行为(全球新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新闻学教授斯蒂芬·里斯(Stephen Reese)对此分析道:“最终,可能更有意义的是,认识到全球化的媒体和新闻仅仅意味着新闻的制作者、对象以及消费者不太可能共享相同的民族国家的参照系……因此,媒体的作用不能狭隘地被视为等同于一个特定的卫星网络、新闻消息或全球范围的观众,不论其规模有多大。国际频道及信息流可能是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但它们构成的是‘CNN版’的媒介全球化。”^②在这里,“CNN版”的媒介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即使媒体组织的工作人员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有着迥异的背景差异,但是传媒机构内“美国中心”化的权力结构仍然占据上风,多元文化的代表性只能是一种“没有参与的代表性”。^③因此,“CNN版”的全球传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里斯关于全球新闻的描述,即“新闻的制作者、对象以及消费者不太可能共享相同的民族国家的参照系”,为理解全球新闻与国际新闻的差异提供了注解。如果将新闻制作者、新闻内容以及受众三者基于民族国家参照系的组合进行列举和归纳,可以得到以下囊括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的所有形态的表格(见表1)。

表1

民族国家参照系	代表性媒体	制作者	新闻	受众
1. 国内新闻	《人民日报》	国内	国内	国内
2. 境内媒体/境内新闻/境外传播	《人民日报》海外版, CCTV 国际频道	国内	国内	国外
3. 境内媒体/境外新闻/境内传播	《环球时报》	国内	国外	国内
4. 境内媒体/境外新闻/境外传播	CCTV 北美中心台、非洲中心台等	国内	国外	国外
5. 境外媒体/境内新闻/境内传播	CNN 亚洲台, BBC 亚洲台	国外	国内	国内
6. 境外媒体/境内新闻/境外传播	CNN、BBC 驻华机构	国外	国内	国外
7. 境外媒体/境外新闻/境内传播	《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国外	国外	国内
8. 境外新闻	《华尔街日报》	国外	国外	国外

当新闻的制作者、对象以及受众共享相同的民族国家的参照系时,便构成了表1中的第1种类型“国内新闻”与第8项“境外新闻”。它们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的范畴,所以在此不作赘述。很显然,国际新闻在中国的定义,目前仅仅局限于第2种类型“境内媒体/境内新闻/境外传播”(即“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外宣型传播,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CCTV国际频道为代表),以及第3种类型“境内媒体/境外新闻/境内传播”(即“向中国介绍世界”型传播,以《环球时报》以及各媒体的“国际新闻”板块为代表)。这种“对外”或“对内”的传播,是新闻制作者使用同一民族国家参照系实现的信息的单方面流动。因此,新闻的视野、价值观并不具备国际性。“国际”在这里的含义仅指新闻信息进行了跨越国界的流动,而这种流动不是基于受众的主观需要,而是借助国家“强力推

① 参见 Volkmer, Ingrid,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Crises, In B. Zelizer & S. Allan Eds., *Journalism after September*, 11, 2002, pp. 235-246, New York: Routledge.

② Reese, Stephen D., Jour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Sociology Compass*, 2010, 4(6), pp. 344-353.

③ Hafez, Kai, Global Journalism for Global Governance? Theoretical Visions, Practical Constraints, *Journalism* 2011, 12(4), pp. 483-496.

行”的模式实现,传播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例如,在接受中国记者的访谈时,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克里·布朗直言“一般西方人看到中国媒体上的信息,第一反应是‘怀疑’”。^①

那么,国际传播是否有可能不必借力于国家推行,仅仅因其新闻视野、价值观的国际性而被国际社会接受?第4种类型“境内媒体/境外新闻/境外传播”中,中国媒体在境外采访、报道,服务当地受众(前提是当地民众愿意阅听),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行模式。CCTV北美中心台、非洲中心台就属于此类。从国家形象推广的角度来说,“境内媒体/境外新闻/境外传播”的效果应优于“外宣”,因为这类新闻出现于当地媒介的前提必然是淡化中国主流价值观或官方立场,并理解与尊重当地价值观。受众不必依循中国的民族国家参照系来理解新闻,反而有利于减缓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表1中的第5、6、7种类型代表着境外媒体在中国做新闻的模式。第5种类型“境外媒体/境内新闻/境内传播”,虽然新闻制作者来自境外,但新闻内容与消费者都来自境内,其代表包括CNN或BBC亚洲台等。由于这些新闻在阐释国内事件时秉承的是境外国家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此它也可以被视作境外媒体的“外宣”新闻。例如,这些媒体对于“重庆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就鲜明地体现了基于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判断。与我国“外宣”新闻的差别在于,此类型新闻虽同样就地取材,涉及的却往往是境内媒体未能涉猎的范畴,因而增加了境内受众的兴趣。第6种类型“境外媒体/境内新闻/境外传播”,由于境外媒体记者常驻境内,在制作新闻过程中较为深入地理解了当地文化与价值观,并通过自身的理解来进行解释,因而容易被与他们共享一个民族国家参照系的境外受众所接受。第7种类型“境外媒体/境外新闻/境内传播”,主要包括国际媒体的中文版,如《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等。同第5种类型一样,这些新闻通常也会隐含境外国家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偏向。它与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的区别在于,新闻传播制作及传播过程并非直接受到国家或政府的动员和推动,而更多地基于新闻专业主义、市场和受众的信息需求等因素实现。

以上类型的新闻传播,其传播主体、目的、过程、内容和对象的确立都是基于特定的民族国家参照系,都没有脱离“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的冲突框架,因此依据前文的概念辨析,都属于国际新闻范畴。但是即使都是国际新闻,我国与他国媒体之间也存在差别。第一,我国目前第4种类型“境内媒体/境外内容/境外传播”尚缺实力。这类国际新闻需要报道者深入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才能获得当地受众的认可,否则只能水土不服。第二,即使是中国与其他国际媒体共有的国际新闻模式,受众的接受程度也呈现很大差异。比如,中国读者常常会主动阅读《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而在境外阅读《人民日报》海外版或收看CCTV国际频道的,多半只是海外华人或是从事中国研究的专业人士。

以上分类归纳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以脱离民族国家参照系为核心表征的全球传播(例如,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全球知识平台^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我们距离全球新闻却依然遥远。即使像CNN国际频道这样的跨国电视网络,也会将内容依据传播者的意图或国家、地区受众的喜好来进行分割与匹配,导致各国人民看到的CNN新闻不尽相同,事实上等同于各国家媒体的杂糅。因此,它“并不是中立的全球治理的代理者,而是爱国情绪的代理人”。^③这显然不符合前文所述里斯关于全球新闻的制作者、对象与消费者不共享同一民族国家参照系的标准,因为当地民众可能仍然以他们熟悉的方式,只关注和知晓当地事件。因此,对于新闻事件的理解仍然是国别化的、断裂的,没有形

① 参见人民网:2011年9月21日《扩大中国声音 提升中国形象(国际视野)——海外人士谈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11193.html。

② 维基百科在一些涉及民族国家的词条编辑时也存在自身的价值取向,但这里主要指的是它所提供的价值中立的知识。

③ Hafez, Kai, Global Journalism for Global Governance? Theoretical Visions, Practical Constraints, *Journalism*, 2011, 12(4), pp. 483-496.

成一个“建立于连锁的、对事件的跨国关注之上‘全球新闻场域’”。^①

全球化时代国际新闻报道现状

“全球新闻”尚遥远,而国际新闻报道现状也堪忧。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时代并不是一个主流媒体不断增加国外新闻报道的时代;相反,全球的新闻地图由一些“热点”地区和广大的“空白”地区所构成。^②国际新闻报道的局限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视野局限

国际新闻界一直以来存在着“新闻业的英美霸权模式”(the hegemony of the Anglo-American model of journalism)。^③处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重要位置的国家,通常最广泛地出现于国际新闻之中而成为“热点”,例如政治经济强国英国与美国。而“广大空白地区”覆盖了对世界格局影响甚微的国家,例如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除非出现了战争或暴力的危机,否则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卢旺达或索马里就是如此。

哈菲兹对德国报纸关于中东报道的长期研究表明,在超过 12 000 篇新闻中,全国性报纸对于由 30 多个国家组成的从北非到巴基斯坦这一区域的报道仅有两到三篇。该研究还表明,欧洲报纸新闻中关于非欧洲国家的新闻报道大约有 60%—80% 是纯粹的政治新闻。^④对于中国的报道,常常是当某个中国领导人出访时,或地方局势出现动荡时(如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才会出现。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美国。研究表明,美国的大型电视网络在冷战结束后,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了外国新闻减少的趋势。^⑤

国际新闻格局中不仅存在东西之间的视野局限,而且也存在南北之间的报道鸿沟。例如,一名记者通过对 2010 年国际大事报道中的“华人视野”与“西方视野”进行比较发现,吉尔吉斯斯坦政变以及科特迪瓦大选这样的国际大事被中国和西方的媒体普遍忽略。而西方世界对于广袤的非洲大陆的报道,长期被充斥着白人特权视野的、关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的报道所垄断。主流国际新闻媒体依其价值与兴趣偏向,提供以事件为中心、缺乏系统的背景性阐释的碎片信息,导致受众对世界的看法不仅极其有限,而且“非常支离破碎、去语境化以及对于复杂性(认知)的危险损失”。^⑥

新的传播环境也带来了国际新闻报道的现实困难。传统媒体的衰落与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海外报道预算大幅消减,各国媒体派驻的海外记者的数量正在逐年严重下滑。虽然新媒体的兴起明显提升了现场报道与信息收集的机会与频次,但一些国家在国际报道中占主导地位,以及记者的专业训练缺乏等事实削弱了这些优势。因此,专业的、长驻国外的越来越少,而国际新闻也因为资源萎缩、截稿急迫而变得匆忙而肤浅。^⑦

(二) 信息偏颇

视野局限的伴生特征是信息偏颇。在西方国际新闻中,伊朗与朝鲜的出现常常与核危机有关;非洲地区永远是贫穷、饥饿和疾病的滋生地。在这些符号化的极端形象之中,国家和地区本身的多元与

① Reese, Stephen D., *Jour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Sociology Compass*, 2010, 4(6), pp. 344-353.

② Hafez, Kai, *Global Journalism for Global Governance? Theoretical Visions, Practical Constraints*, *Journalism*, 2011, 12(4), pp. 483-496.

③ Williams, Kevi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London: Sage, 2011, p. 13.

④ Hafez, Kai, *The Myth of Media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et al.: Polity, 2007.

⑤ Norris, Pippa, *The Restless Searchlight: Network News Framing of the Cold War World*, Cambridge, Mas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⑥ 参见沈旭晖《2010 国际大事名单: 华人视野 VS 西方视野》,《南方都市报》2011 年 1 月 5 日。

⑦ Williams, Kevi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London: Sage, 2011.

复杂性被忽略,造成受众的片面性理解。

视野局限与信息偏颇的根源在于国际新闻报道旨在服务于民族国家利益,脱离不了爱国主义、民族优越感、民族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或其他偏见。^①在这些偏见的指导下,新闻倾向于对民族国家进行美化和辩护,对友国进行声援与支持,而对敌人进行妖魔化与谴责。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的主流媒体很少会开辟版面给予反对战争的人;同样的道理,有关“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新闻数量,与其真实的规模和社会影响相比,不值一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在近距离观察这场运动之后,形容媒体报道具有“不出所料”(predictability)、“懒惰”(laziness)以及“下意识的先入之见”(knee-jerk preconceptions)等特征。他举例说,媒体故技重施,使用了他们在报道20世纪60年代反战抗议活动中使用的修辞手段和报道战术,“只关注那些怪异的被社会遗弃者,将整场运动描述成一个犯罪故事,并在怀疑抗议者的合法性时,顺从于当局权威”。^②与此同理,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偏见,也在2008年西藏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抗议。美国媒体从业者也曾承认由于“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他们经常会忽略事件的关键性因素,误解甚至曲解事件真相。^③

另一个导致信息偏颇的原因在于新闻报道操作层面的“归化”效应。受众通常难以理解发生在遥远国度的新闻事件。为便利当地观众的理解,媒介往往需要将事件置于“一个现成的,不仅为观众所熟悉,而且也为新闻记者所熟悉和识别的叙事框架之中”,以尽量减少地理及文化上的不熟悉感,这就是“归化”。^④新闻报道由此增强了“文化接近性”,即一个人选择来自自身文化的媒介产品的倾向性,^⑤并避免了“文化折扣”效应——受众难以在现有文化语境中对新闻进行认知,因而对新闻的需求和欣赏度减弱。^⑥运用“归化”概念,古瑞维奇等人说明了在面向本国观众的新闻制作过程中,国际事件是如何被诠释的:

媒体既保持全球的,又保持特定的文化取向——正如在报道发生在遥远地点的事件时,将他们置于使这些事件易于理解的框架之中,吸引国内观众,并使事件与他们关联起来;其次,通过这些事件与媒介为其服务的文化以及主导意识形态相容的方式,来构建这些事件的意义。^⑦

古瑞维奇等人的描述包含了新闻“归化”的两个方面:创造文化的相关性和加强主导意识形态。例如,在报道诸如“9·11”恐怖袭击这样的全球危机时,“归化”现象十分明显。学者罗杰基发现,美

① Lee, C. C., Z. Pan, et al., Through the Eyes of U. S. Media: Banging the Democracy Dru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1, 51(2), p. 345.

② Mallary Jean Tenore: Gitlin: Media Coverage of Occupy Wall Street Is Predictably Lazy, but Likely to Improve, <http://www.poynter.org/latest-news/top-stories/149139/gitlin-media-coverage-of-occupy-wall-street-is-predictably-lazy-but-likely-to-improve/>.

③ 参见张君昌《中国媒体怎样才能走向世界——漫谈国际传播》,《北方传媒研究》2006年第6期。

④ Gurevitch, M., M. R. Levy, et al., The Global Newsroom: Convergences and Diversities, In P. Dahlgren and C. Sparks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Television New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⑤ Galtung, J. and M. H. Ruge,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go, Cuba and Cyprus in Four Norwegian Newspape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65, 2(1), pp. 65-91; Straubhaar, J., Choosing National TV: Cultural Capital, Language, and Cultural Proximity in Brazil, In M. G. Elasmars Ed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A Paradigm Shift*, Mahwah, New Jersey; London, 2003, LEA, pp. 77-110.

⑥ Hoskins, c. and R. Mirus, Reasons for the U. 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88, 4(10), pp. 499-515.

⑦ Gurevitch, M., M. R. Levy, et al., The Global Newsroom: Convergences and Diversities, In P. Dahlgren and C. Sparks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Television New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205.

国新闻界对于恐怖袭击的报道隐含着这样的暗示,即鉴于恐怖主义的可怕后果,批评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则显得浮夸不适。通过这样的暗示,新闻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支持。^①同样,学者克劳森发现,有关国际社会第一次纪念“9·11”的活动的新闻,没有出现“全球性”的新闻报道;相反,“所有故事都被设计,被从特定角度解读,措辞也旨在迎合本国观众的情绪和认知框架”。^②

虽然“归化”使得国内观众更容易理解新闻事件,但它往往妨碍观众从全球性战略高度来理解和解决风险。例如,一项针对美联社、新华社及韩联社关于朝鲜核试验报道的框架研究发现,由于每个国家在世界权力体系中的不同地位,美联社将朝核问题纳入“反恐战争”的框架,新华社坚持谈判和平解决的原则,而韩联社的报道体现了“冷战”思维。这种“各为其主”的国际新闻格局,显然不利于各国受众在认知与解决朝核问题中的全球性合作。^③

国际新闻报道人才培养模式之考察

克服视野局限与信息偏颇是国际新闻记者的共同任务。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形象的建立与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开辟,不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唯一诉求,以一种生硬的姿态推行主流价值观;相反,它依赖于新闻工作者广泛、开放地接受多元文化,理解各国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差异,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体现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

目前中国的国际新闻人才培养,缺乏制度上的前瞻性、观念上的创新性以及模式上的系统设计与规范。就制度而言,国家形象的国际推广战略,而非全球化时代的新闻需求,成为国际新闻人才培养的项目建设、教育及科研投资规模的决定因素。这种功利的、因时因事而缺乏长远目标的、使教育成为政治附庸的制度,将无法经受历史及国际局势变幻的考验。就观念而言,一部分教育者仍然完全从服务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和传授国际新闻报道(多数期刊中的论文体现了这样的思维),尚未认识到全球化时代信息沟通的需要才是国际新闻人才培养的动力之源。而培养模式上的混乱与缺乏设计,更是后患无穷。例如,目前国内人才培养的三种模式分别是:通才型(外语+新闻学+国际关系);能力型(新闻技能+议程设置能力+熟悉国际传播“语汇”和“游戏规则”);特殊型(专门培养:专款、专项、特殊学制)。可以看出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仍然沿袭多年来的惯性思维,强调语言(通常仅仅是英语)、新闻学本身的训练,而缺乏对除国际关系之外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通识教育,以及让学生走出国门真正置身于国际社会锻炼报道的机会。

为了了解国外的国际新闻报道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指南和参考,本文以英美国大学开办的“国际新闻”相关课程和项目为研究对象,总结和梳理了以下经验。

(一) 强化交叉学科培养模式

强调新闻传播学之外的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是美国国际新闻教育中的一个显著特色。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该校其他学院共同开设双硕士学位专业,包括新闻学与商业、新闻学与计算机科学、新闻学与国际和公共事务、新闻学与法学、新闻学与宗教学。学生需要同时分别被两个学院录取,且在每个学院都要修满一定的学分。跨学科的专业结合为有志于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新闻学和宗教学,有助于学生了解各民族宗教历史、特征与禁忌,培养对于宗教异见的理

① Rojecki, A., Media Discourse on Globalization and Terr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05 22(1), pp. 63-81.

② Clausen, L., Localizing the Global: “Domestication” Processes in International News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4, 26(1), p. 113.

③ 参见 Jia Dai, Kideuk Hyun, Global Risk, Domestic Framing: Coverage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by US,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News Agenci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0, 20(3), pp. 299-317.

解与宽容,以及如何与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交往。同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明确建议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从农学院的“国际农业发展”,到人类学系的“欧洲文化”,再从地理系的“世界地区与民族国家”到历史系的“十八世纪以来的东南亚”等等无所不包。^①

反观我国,由于大学内部院系之间的资源整合与交流都非常有限,跨专业的学习得不到激励。同时由于对“修学分”的强调,可供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学分以及自由使用的时间都被挤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中跨专业选课基本上成了无法实现的空话,通才教育无从谈起”。^②

(二) 跨国办学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为学生提供机会到国外实地考察和了解国际社会,培养国际视野,是外国国际新闻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哥伦比亚大学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和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设立了硕士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学生在本校获得一年制的硕士学位后,可以申请去这两所大学学习与工作(反之亦然),获取双学位。课程内容包括法国与约翰内斯堡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同时,这些学校还保证为哥大的学生提供在当地媒体实习和工作的机会。正如学院网页对于这个项目的介绍,“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反映了21世纪新闻业的全球性。学生受到一流的美国及国际视野的训练,这些训练有助于新闻报道技巧的掌握,并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国际背景的发展机会”。^③此外,学院还与德国、阿根廷、印度和西班牙等国的媒介机构设立有交换或学习项目。学生会在这些国家的媒体中实习3个月到1年不等的時間,不仅要学习(或已经掌握)当地语言,还要实际参与新闻报道。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与多所大学联合建立双学位培养项目之外,^④交流与学习项目还包括三类:交换、实习与短期项目。交换学生的伙伴大学遍布澳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实习所在地包括阿根廷、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实习过程由学院教授或项目负责人带队,对实习进行督导。在寒暑假还有世界各地的短期访问和实习项目。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合作伙伴包括欧洲与亚洲的25个大学或研究机构。该校传播与媒体研究所属下的中国传媒中心,其国际性不仅体现在与中国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师生交换与联合培养,而且体现显著的外交使命感。例如,该中心与中国国务院、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国际传媒援助以及诸多英国媒介创意产业的顾问公司合作,并在英国议会及财政大臣官邸举办有关中国的系列公益讲座等,增进英国及欧洲其他各国对中国社会和传媒制度的了解及交流。该中心还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湖南卫视及南方传媒集团等开展培训。^⑤

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院系也意识到国际学习与培训的重要性,纷纷建立起与国外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或交换的项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包括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内的许多国际一流大学建立了国际合作双学位项目合作。另外还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建立了一个学期的短期交流项目。全院有35%的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参加至少一次国际交流学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在国内同行中率先把“国际化办学”作为新闻教育改革的切入点,不仅创办了内地首个全英文教学的硕士项目“全球财经新闻”,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而

①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at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http://journalism.missouri.edu/overlay-content/international-journalism-interdisciplinary/>.

② 参见陈昌凤《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汇流:世界新闻传播教育走向研究》,见“北大论坛”论文集编委会《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3页。

③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Program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ttp://www.journalism.columbia.edu/page/211-international-journalism-programs/212>.

④ 目前,与美国密苏里大学联合建立双学位培养项目的中国大学包括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

⑤ 参见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属下的中国传媒中心介绍, <http://www.westminster.ac.uk/research/a-z/china-media-centre>。

且也与众多海外大学及媒介合作,学院超过80%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机会进行海外实习报道与学术交流。

(三) 工作坊培养本土关怀

交叉学科培养与出国学习培训是国际新闻人才培养中的“硬件”,决定人才培养的广度,而对于本土的社会关怀和人文理解是“软件”,决定人才培养的深度。在这方面,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学院开设的工作坊性质的“报道中国:外国记者工作坊”课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该课程由前资深记者特雷西·达尔比(Tracy Dahlby)带队,在每年5月到中国进行为期4周的密集报道。达尔比曾经担任《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驻东京的总编,报道过中国、日本、韩国及南亚地区,并曾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写亚洲故事。他的课程设计紧密围绕如何发展美国学生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关切理解而展开(以下内容翻译并节选自2011年的课程提纲):^①

课程目标:好的记者是被释放到世间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们通过观察和报道其发现,将那些除极少数人之外所有人都浑然不觉的现象公之于众。这门课程的重要目标,除了掌握常规新闻报道中的技巧外,还强调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快速、高效地准备报道,并处理海外工作遇到的后勤与报道方面的挑战。为了负责任且合乎伦理地与报道领域里的个人打交道,需要发展跨文化调查和理解的必要技能。同时,报道宏大议题时,需要与实地调查得来的事实进行比照,并准确地向美国观众进行报道,不但使他们获得信息,而且要对这些信息产生真正的关注。

实地报道:工作坊的报道将在中国面临国内外的持续挑战的背景下,衡量其各方面令人刮目的重大进展。实地报道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记者们在北京的初期现场报道将专注于如何建立“横向背景”,即尽快让自己熟悉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关键问题,通过与北京驻地专家的会面学习如何作为一个外来者接近大事件的真相。而这一过程涉及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审视:一方面是美国的观点,它常常将这个亚洲新的经济巨头描绘成一个具有威胁的对手;另一方面是这个成长中的超级大国在国内面临的诸多问题:贫富分化,城乡分化,与之伴生的社会混乱,以及使得社会历史转型更加复杂化的政治与文化动荡。与此同时,学生记者们被分到三个小组,每个小组聚焦于一个需要进行实地深入报道的“垂直领域”。第二阶段:从北京乘坐火车与汽车抵达杭州郊外的谢家桥山区,体验中国乡村生活。考察内容包括走访邻近的村庄,寻找对比与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为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及其成因提供线索。同时也找机会报道一些能够反映中国社会从农村到城镇转型的希望与危险的故事,或一些能够反映当地日常生活纹理的故事。第三阶段:前往炫耀性消费、流行文化以及大众传播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中国最为紧迫的问题的微缩世界——上海。学生记者们将他们的作品发表于“聚焦中国”网站。^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习如何编辑判断,对内容进行完善和润色。其目标是:制作一个引人入胜的,体现专业素养的关于一个崛起的大国和它的人民的新闻报道。

准备工作:在工作坊开始之前的春季学期中,每周开会2小时,除了一些后勤及技术上的准备,还包括对于中国的“横向背景”知识的理解,分别通过以下工作实现:关注及推进有关中国的新闻流;阅读,建立关于中国的“横向背景”;创建一个中国和中美关系面临的广泛问题清单;对于特定问题进行深入阅读,建立关于问题的“垂直”背景;创建故事列表和镜头列表;确定报道新闻的格式。每次会议讨论过去一周发生的有关中国的新闻,以及讨论布置阅读的相关书籍,并请

① 课程提纲可从此处下载: https://utdirect.utexas.edu/apps/student/coursedocs/nlogon/?semester=20112&department=J++&course_number=&course_title=&unique=&instructor_first=&instructor_last=&course_type=In+Residence&search=Search。

② 参见“聚焦中国”网站 <http://chinaonthebrink.com/chinainfocus/>。

相关人士来发言。同时学生还被要求对奥斯汀当地有新闻价值的中国的人、场所及事件进行报道。

建立关于中国的“横向背景”,同时深入特定“垂直领域”进行报道,为该课程成功培养学生的本土关怀提供了保证。在“聚焦中国”网站上,该课程学生的报道涵盖社会、文化、商业、政治、媒介等领域,话题也多元而丰富,包括微博在中国的发展、同性恋群体、有机食物、中国学生留学热、农村教育改革、中国交通政策、乡镇从事代加工的工厂工人生活状况等。

(四) 培养“创业者”型新闻记者

“创业新闻”(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是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者针对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发展趋势提出的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在传统新闻出版业面临电子媒介的挑战而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一些从业者和学者认为,新闻教育需要促使学生重新审视新闻与经济的关系,将新闻、商业与技术创新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创作能够带来赢利的新闻和能够持续发展的新闻业。新闻记者以经营新闻创业公司(News Startup)的模式来进行新闻报道,因而被称为“创业新闻”。

美国陶氏(Tow)基金会在美国资助了两个相关的项目。其一是纽约市立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创业新闻中心”,致力于媒介以及新闻商业模式改造。^①学院开设了“创业者”新闻硕士项目,在已有的新闻学训练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商业、技术与项目管理培训,并在纽约的创业公司中充当学徒,帮助他们在传统媒体公司内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域。2012年春季学期第一批创业型记者已经获取硕士学位毕业。^②同样由陶氏基金会资助的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研究中心旨在设计与发布关于数字报道的创新方法。^③纽约大学与威斯敏斯特大学同样也为学生开设了创业新闻课程,内容包括创意多媒体新闻,创建新闻中的企业文化等。

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新闻学教育模式,创业新闻也受到质疑:将新闻报道作为创业行为来经营会有损新闻的质量。因此有人认为“创业型”应该更多地强调技术而不是商业层面。这里的“技术”主要指对于整体知识的学习技能,^④例如,从事多元平台的媒体报道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记者除了需要具备多媒体新闻制作与传播的技巧,还需要具备从全球各类新闻信源自主寻找、分析、挖掘和整合数据的能力。

新技术的出现为“创业型”新闻记者培养提供了适时的技术的支持。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以及比较媒体研究系联合建立的“麻省理工学院未来公民媒体中心”,正致力于为“创业新闻”提供技术创新与交流的平台。^⑤该中心与哈佛伯克曼互联网研究中心开发了研究媒体生态系统的“云媒体”(Media Cloud),^⑥以了解专业媒体与公民媒体之间,以及线上与线下新闻来源之间的关系。该系统通过跟踪数以百万计的网络及广播电视新闻,以视觉化的方式帮助研究人员跟踪文化模仿基因的传播、媒体框架以及新闻报道的基调。这样的数据分析技术与目前方兴未艾的“大数据”分析趋势不谋而合,将有助于拓展记者的信源空间,将专业媒体与公民媒体的报道进行整合。

① Staci D. Kramer, Guardian's Emily Bell Leaving for Columbia University, paidContent. org, April 21, 2010, <http://bit.ly/ky2tl9>, Accessed May 12, 2011.

② 对于此新闻的报道参见 <http://www.poynter.org/latest-news/mediawire/105728/cuny-to-offer-nations-first-masters-degree-in-entrepreneurial-journalism/>。

③ Sept. 20, 2010, <http://www.poynter.org/column.asp?id=45&aid=190946>, Accessed May 12, 2011.

④ 关于纽约市立大学授予“创业新闻”硕士学位的新闻评论,参见 <http://www.stoweboyd.com/post/1215964712/entrepreneurial-journalism>。

⑤ Center for Future Civic Media, <http://civic.mit.edu/>, Accessed May 12, 2011.

⑥ 参见 <http://civic.mit.edu/media-cloud>。

与此类似,该中心的公民新闻(Media RDI)^①项目同样致力于将媒介内容与信息源进行视觉化处理,并自动提供数字媒介的“有营养的信息标签”。这样的标签将为信息使用者(记者或读者)回答以下问题:你正在阅读的某某报纸中有什么内容?什么内容没有被报道?你是否得到了你需要的当地、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所有的新闻?该项目还计划推出一个工具,允许用户跟踪他们在一天或一周中都接触过哪些媒体,以及将用户的媒介消费行为与他人进行比较。

结语:国际新闻向全球新闻的转变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随着新闻制作者、制作对象与消费者共享一个特定民族国家参照系的趋势逐渐减弱,新的传播格局或逻辑已经显现。根据曼纽尔·卡斯特的论述,信息的流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组织的中心,它联结并整合世界各地,将基于特定区域或地点的“位置的空间”(space of places)转换成重构空间与距离概念的“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②。在这一新的空间形式中,信息的流动必然以多元的民族国家参照系之间的竞争与整合为基础。任何单边地强化某一特定民族国家价值观的传播行为,也必然受到冷遇或挑战。因此,以服务国家利益和塑造国家形象为目的,依靠举国动员来发起、依赖行政权力来推进、企图向世界强行宣传与推广特定文化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需要向基于全球受众信息交流的自发需要、超越一国立场并关注全球人类共同话题的全球传播转变。国际传播服务于特定民族国家,而全球传播旨在实现全球沟通与治理。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国际新闻报道人才培养模式,应该面向全球治理的目标,培养全球传播人才,以顺应网络社会新闻传播的时代趋势。而实现这一目标目前面临的挑战,除了克服前文所述专业领域内的视野局限与信息偏颇,更为迫切的是在政治话语体系与公共生活中保障新闻自由与民意畅通,促使国内舆论环境与国际舆论环境的接轨。中国新闻现有的“喉舌”模式,是特定文化领导下,意识形态再生产和强化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之下,“作为西方新闻理论表述活动的逻辑起点的新闻自由,在中国则成了新闻学理论表述中的‘盲点’”,“新闻学难以透视现代人的新闻需要”。^③西方新闻“起点”与中国新闻“盲点”之间的落差,除非有所减缓,否则无论是国际传播,还是全球传播,都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责任编辑:匡云)

① 参见 <http://civic.mit.edu/mediardi>。

② Castells, Manuel (1996-1998),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3 Volumes, Oxford: Blackwell.

③ 单波《论我国新闻学想像力的缺失及其成因》,《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ABSTRACTS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Two Parties of the U. S. A.

Hu Angang , Yang Zhulong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agenda , political election and programmatic docum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 the authors compa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2012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with the 2012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 which indicates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bears more various forms , stricter procedures , and more fruitful achievement of democracy. The system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s highly compatible to China's real conditions ,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ll of the Chinese with national public goods , but also narrows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A. , creates unique institu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worldwide , and indicates the superiority of China's system.

Dynamic Impact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on Internat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GVAR Model of 33 Countries

Zhang Hong , Li Yang , Zhang Ya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ot only has direct impacts on domestic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 but also imposes indirect effects on global energy and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chann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s. The impact analysi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on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facilitates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conomy , energy and emissions , as well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for th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s. The empirical studies based on 33-country GVAR model reveals that , under the shock from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 slightly , and reach the peak in the 2nd year; but the long effect approaches zero;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U. S. A. , Euro area and Japan present positive responses , but India has opposite respons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 as the evidence of their idiosyncratic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foreign shock. By contrast ,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 S. A. leads to a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the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 and the impacts are 6 times that of China , demonstrating its leading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channel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ate , Market and Class in Mass Entertainments——A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of Reform-era Chinese Television Drama

Zhao Yuezhi , Wu Changcha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macro-structural analysis of reform-era Chinese television drama industry from a multifaceted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with insights from policy research , production study , and textual analysis , which examines how state , capital and societal forces in reform-era China have intersected to shape bot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thematic orientations of Chinese television drama in a complex and dynamic fashion. Specifically ,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the ideological orientations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authorities , the government's constantly readjusted control and regulatory directives , the profit motives of private capital , the agency of television drama producers and broadcasters , along with the highly active audiences of a rapidly transforming Chinese society ,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a fluid ,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centering on the television drama , making it the most dynamic media industrial form and meaning production site in reform-era China.

Distinguishing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Global Journalism*——The Innovation of Glob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Dai Jia , Shi Anbin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multiple subjects including individuals , groups , organizations , average citizens , and governments , distribute information , values and attitudes cross national borders.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the two concepts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global journalism*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 and proposes to develop global communication personnel to adjust to the new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of network society , as well as to realize global governance. And to achieve this goal , the urgent task is to protect press freedom and free exchange of public opinion.